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动海外，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富有爱国传统的广大侨胞满怀赤子之心，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自勉自励，大规模地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建立救亡团体，声援祖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华侨在原有侨团的基础上，成立了许多以救国为宗旨的抗日团体。在美国，有华盛顿的“华侨抗日后援会”纽约的“华侨抗日救国协会”和“美洲反帝大同盟”以及旧金山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在东南亚，有新加坡“中华民族自卫会”、马来西亚“和平保障会”等。这些团体或单独呼吁，或联合行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受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华侨救亡团体纷纷实现联合。1936 年 1 月中旬，纽约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华侨爱国组织——纽约各界华侨抗日救国协会。继而，美国其它一些地区的华侨社团，以抗日为前提，也先后实现了联合。1936 年 9 月 18 日，全欧各地各界的 40 多个华侨团体汇集一堂，成立了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作为欧洲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组织。

八一三事变的翌日，南洋地区第一个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华侨救亡团体——“新加坡筹赈会”在新宣告成立，陈嘉庚担任主席。此后，东南亚各地竞相成立以“筹赈”和“慈善”为名的救亡组织。1938 年 10 月 10 日，中华民国国庆这一天，在陈嘉庚、李清泉、庄西言等倡议和组织下，来自南洋 45 个华侨团体的 164 位代表，齐聚新加坡，共商救国救乡大计。会议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东南亚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机关。陈嘉庚被推戴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当选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总办事处设在新加坡，下设 68 个分会，会员遍及东南亚各地。它的宗旨是联络南洋各地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积极劝募国债，推销国货。南侨总会在其存在的 4 年多时间里，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美洲，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闻悉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当晚就在纽约组成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37 年 8 月，旧金山在中华会馆的协调推动下，成立了统一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1943 年 9 月，美国华侨进一步团结联合起来，在纽约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全美华侨抗日救国会筹饷机关代表大会，这是美国华侨百年来最具有意义之

创举。抗战时期，遍及美国各地的爱国华侨组织达 95 个。此外，侨居澳洲、新西兰以及非洲的华人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有些海外救国团体还发起成立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支援东江纵队的‘惠州救乡会’和捐助琼崖纵队的‘援冯委员会。”

据统计,到 1940 年底，海外华侨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达 2794 个,规模较大的有 649 个。这支浩浩荡荡的海外华侨抗日救亡大军，成为支持祖国持久抗战的重要力量。

二、义务筹赈捐献，资助祖国抗战

各种救亡团体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活动，一面开展募捐活动。号召侨胞‘各尽所能,各尽所有,踊跃慷慨,贡献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之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之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海外赤子对中国战区难民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旷世未有。他们首先在财力上大力支援祖国,主要是捐款和侨汇。华侨捐款的形式主要有常月捐和特别捐两大类，前者是依固定数目按月缴纳;后者是各种临时性专项捐款的总称,包括救灾捐、难童捐、购机捐、寒衣捐、劳军捐等,另外还有购买公债、义演义卖等形式。

南洋各地华侨的义捐声势很大,特别是常月捐,最有影响。马来亚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华侨筹赈会曾分别发出《劝募长期月捐活动》和《扩大推行常月捐宣言》,指出‘华侨助赈祖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抗战一日不停,我们为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广大华侨奋起响应,每月认捐约 700 万元(国币)。美国各地的侨

胞也慷慨捐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 8 年,旅美华侨每人每年平均捐款 200 美元以上。当时,美国华侨约 10 万人,共筹得款项约 2 亿美元。远居南美、西欧的侨胞也不甘落后,同样积极募捐。如秘鲁的侨胞,仅 7000 人,到 1938 年底,筹得抗日捐款 280 余万元,平均每人约 400 元。侨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员同胞,从 1937 年起,每周捐献工资收入的 20%,成为按月长期认捐的典型。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抗战的 8 年中,海外华侨共捐献 13 亿多元。此外,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发行 5 亿元国债,华侨就认购一半,最后也全部无偿贡献给祖国。这一时期,侨汇急剧增加。1938 年前,平均每年约 3 亿元,而 1939 年增至 12 亿元,1940 年竟达 20 亿元之多。这些捐款和侨汇在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算过这样两笔帐。第一笔,1939 年全国战争军费开支 18 亿元国币,而是年华侨捐献约占三分之一。第二笔,抗战时全国正规军 300 个师共 300 万人,每月食饷共为 4650 万元,而海外华侨每月义捐可达 5400 万元。换言之,华侨每月义捐养活 300 万大军还有 700 万元的余额。国民政府用现金抵偿贸易逆差,1937 年至 1940 年共 720,001 万元,其中侨汇占 62%。这些钱,都是华侨在海外终年劳累所得的血汗钱,而他们却慷慨捐资祖国的抗战,表现了广大侨胞舍家爱国的高尚精神和民族感情。

在物资方面,华侨源源不绝地捐献生活物资和大批军用物资。鉴于祖国空军力量薄弱,七七事变前,海外华侨掀起献机运动。美国旧金山华侨在短时期捐献飞机 10 架。菲律宾的华侨名列海外之冠,到 1938 年底,就献飞机 50 架。至于其它军用物资的捐献,成绩亦是斐然。美国和缅甸华侨

捐赠的救护车、运输车各达百辆以上。新加坡华侨仅 10 多天内就捐献卡车 40 多辆。国内所急需的药品、寒衣等,海外华侨也总是千方百计帮助解决。据载，从 1937 年下半年到 1940 年上半年，华侨捐赠的各种物资总数在 3000 批以上，平均每月有 100 批左右。捐献的各种飞机共 217 架、战车 27 部、救护车 1000 余辆、大米 1 万袋,再加上药品、服装、胶鞋等其它用品,价值共计约合 1.06 亿美元。

在华侨筹赈运动中，爱国侨领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出钱出力的带头人。

在东南亚，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慨然解囊，自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之日起，即认常月捐至战争终止，每月国币 2000 元,并购买 10万元救国公债，当即焚烧债券，作为义捐，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因此，毛泽东称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南侨总会副主席、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带头认购救国公债 40万元，临终遗言还嘱咐捐款 10 万美元抚养祖国难童。巴达维亚侨领丘元荣，出钱出力，成绩卓著。

抗战爆发后，在美国，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两位老先生“即本国民救国之职……,呼吁捐输,呼吁国内民主团结”，与此同时，“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旧金山华商会主席邝炳麟，仅劳军一项，就捐资 10 万美元。在各救亡团体的组织和各地侨领的模范作用影响下，筹赈运动如火如荼，感人事迹层出不穷，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澳大利亚美军华人服务营内一位老华侨,年近古稀,闻捐款抗敌,即将其数十年积蓄 300 余金镑，悉数捐献。友人劝阻，他慨然回答：“我老了，行将入土，能以区区微金，贡献祖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是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表现了华侨一心为国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一位家住底特律的华侨妇女简夫人深情地说：“我虽然未曾到过中国，未曾见到过中国的一切，但是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母亲。”在抗战最初的6个月内，她变卖家产，至少捐出1.5万美元，还说：“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捐献最后1元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

任何阶层的华侨，都投身于为国捐输的洪流中。象乞丐、囚犯、舞女以及青楼女子也出于民族大义，倾囊赞助祖国。马来西亚一乞丐赖凉，年逾花甲，当天乞得4角钱，除饭费外尚余3角。他手持木杖行至救难会，将余钱献出后说：“余虽行乞，尚能平安度日，较之祖国难民，饥号啼哭家破人亡，则优越的多矣！”

三、踊跃回国效命，参加祖国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华侨奔赴祖国。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战的感人场面。有一位寡妇，把自己心爱的独生儿子送回国从军，说：“吾已无钱，又年老无力，殊有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天职，惟有捐吾爱子。”挚情诚真，令人潸然泪下。菲律宾老华侨亲自送子回国，并鼓励道：“我老矣，恨不能亲自效命疆场，尚望吾儿置父母身家于度外，身先伙伴，努力扫荡寇气，使我得见中国胜利，安然瞑目以终年，则汝之忠可全，而孝亦大矣！”据广东侨务委员会统计，抗战期间，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约4万人，从抗战爆发到次年2月，仅从广州口岸回国的华侨就有30批，其中有34个团体，近2000人。

回国的爱国华侨，有的驾驶战机保卫祖国的领空；有的组成各种服务团体，活跃于抗日的战场上；有的驰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同国内战士一起武装抗击日寇。有资料说，抗日期间，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占四分之三，他们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从 1937 年 8 月到 1938 年 6 月，仅陈瑞佃、黄泮扬、黄新瑞 3 名华侨飞行员就击落敌机 15 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华侨医务工作者也冒着生命危险，踊跃回国服务。由 30 多位医生和 50 多名救护人员组成的荷属华侨救护队，辛勤地奔劳于前后方，救护运送伤病员，每天忙得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国际援华的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技工，南侨总会应西南运输公司要求进行招聘，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 3200余人，组成了声名远播的“南侨机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驰在长达 1164 公里的运输线上，使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 300 吨的水平。

很多华侨青年，冲破敌人的封锁，克服种种困难，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马来亚柔佛华工彭士馨等 15 人组成的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携带着南洋侨胞捐献的两部汽车，历尽艰辛，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不久，又有马运添为团长的第二批华侨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为八路军服务，并赠送八路军汽车 8 辆，药品数车。留在延安的各国华侨 170 余人，先后成立了华侨回国服务团留延办事处和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与延安军民并肩战斗。1939 年马来亚、越南、泰国等地华侨和港澳青年共 400 人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州等地宣传抗日，救济难民，组织武装，后来大部分参加了东江纵队。日军入侵海南岛

之后，南洋和香港许多琼崖籍的青年也组织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到海南岛协助琼崖纵队进行抗日活动。

在抗日战场上，既有华侨留下的脚印，也有华侨抛洒的热血。他们的壮举感人至深，他们的精神与日长存。其中，印尼女侨李林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抗战爆发后，她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奋战在晋绥前线，不久即成为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性格刚烈，智勇双全，屡立战功，被尊称为“雁北游击队名将”,为边区群众最熟悉、最爱戴、最钦佩。1940 年 4 月，在日军对晋绥边区的第九次围攻中，李林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年仅 24 岁。李林被贺龙誉为‘民族女英雄”,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在唁电中也赞扬她“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仰的女英雄”。

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团长、共产党员沈尔七，1938 年初回国后，辗转参加了新四军，并被评为第二支队的模范军人。他曾两度出国，带回侨胞援助新四军的大量捐款、药品、军事物资和一支由 20 名华工组成的军乐队。由于成绩卓著，受到了叶挺、项英等首长的多次接见和表扬。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正带领第三批爱国侨胞欲归新四军的沈尔七转移参加了东江纵队，不幸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为国捐躯，用生命和鲜血实现了他自己“为祖国甘愿献身”的豪迈誓言。

旧中国积贫积弱，国力匮乏，人才奇缺，爱国华侨的助战行动，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祖国抗战的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侨胞报效祖国的一片丹心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四、开展对敌斗争，配合祖国抗战

爱国华侨在其居留地还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甚至武装抗敌活动。

各地华侨报纸,如新加坡《南洋商报》、纽约《华侨日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都开辟了抗战宣传的专栏，鼓动广大侨胞关心祖国抗战，热心为抗日救国尽力。许多侨团还组织了讲演队、歌咏队、合唱团、剧团等，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工作。美国许多华侨洗衣店备有宣传小册子，装入洗好的衣服口袋里，分送给顾客，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

为了从经济战线上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华侨在海外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广大侨胞将日货视为仇货，毅然断绝同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转售国货。东南亚地区组织专门的抵货领导机关，号召“各商店不再贩运日货，各饭店各侨胞不再购用日货，各商店原存日货限期肃清。”与此同时,还大力提倡购买、使用国货,支持民族经济的发展。1938 年 1月间，南洋各地华侨组成实业考察团回国调查国货。从此，振兴国货，买卖国货，在海外千余万侨胞中成为热潮。一时间，国货大为畅销，日货则一落千丈。为了抵制日货，爱国华侨还制定了《取缔贩卖仇货章程》，对见利忘义的奸商严厉惩罚。

华侨抵制日货的斗争，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从前生意兴隆的日本商店，现在都门可罗雀。在新加坡经营时间最长、资本最雄厚的弘荣洋行,因此而宣告破产。据 1939 年美国太平洋国家友善会的报告，自爆发抗日战争后，日

本在东南亚每月经济损失至少在 2000 万元以上。日货在此地的销售量,在 1938 年最初 3 个月里就减少了 54%。当时英国商界有人评论说:"这次华人之抵制日货,迄今极深刻紧张,为吾人有生以来所无从寻得相同的并列例证者。"

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的一个重要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在日本开办的工厂、矿山中有许多做苦役的华工,当他们得悉自己生产的铁砂和钢铁、铅片是运往日本,用来制造残害骨肉同胞的武器时,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纷纷罢工罢职。甚至在日营工厂工作的印度、缅甸和土籍工人也有感于华工的爱国精神,采取一致的行动,不为威迫利诱而相继自动罢业退职。日本从马来亚运出的铁砂因此而锐减。1937 年 1 月到 11 月,每月运往日本的铁砂平均 128858 吨,到 12 月,则仅有 12424 吨,比罢工前平均每月少 90%以上,致使一向被人们称为日本武器源泉的八幡制铁所大受冲击。

不供应运动是华侨开展的一项反日群众运动。在美国,这一运动声势浩大。1938 年 12 月初,日本三井公司租用希腊轮船"施祥罗司"号装运 25000 吨废铁从旧金山起航赴日,当地华侨闻之,群情激愤,2 万多人汇成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大军,开进旧金山码头,将该轮团团包围,并派人向中国领事馆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结果大获全胜。在西雅图,日轮"海安丸"号,也准备装运废铁,由于爱国华侨联合美国工人坚决斗争,致使该轮一无所获而去。在日清公司工作的 2000 侨胞,抗战爆发后,拒为日本服务,决然离去,表现了华侨崇高的爱国精神。在南洋,不供应运动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华侨与当地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参加了保卫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和印尼的战斗，并且在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积极开展武装抵抗，组建了许多武装团体，进行地下活动和游击战争。其中，新加坡华侨义勇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最为著名。这些抗日武装都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史册上，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雄浑壮丽的乐章。

五、维护统一战线，支持抗战到底

在国际上，广大侨胞为了争取各国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积极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大造抗日援华的声势，并联合当地的国际友人致力于建立具有国际统一战线性质的反日援华组织。在欧美，有“中美协会”、“纽约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在东南亚，有“华菲协会”和“中国之友社”等。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国际反日援华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在美国，中美联合组织支持华侨在各地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多次发起给日本侵略者以经济制裁的运动；“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发动的“中国周”活动，共捐得 500 万美元巨款，甚至有 200 余名州长、市长先后发表宣言，呼吁美国人民捐款救济中国难民，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在东南亚，缅甸华侨成立了“华、印、缅抵制日货委员会”，统一领导缅甸各族人民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在爪哇，荷兰籍侨民、阿拉伯侨民和当地土著等对我国神圣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战均表无限的同情，并在物质上作慷慨的援助。

广大华侨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支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战爆发不久，在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海外华侨就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书报社等 5 大侨团，派代表到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请愿，要求“实行国共合作，动员全国民兵，一致抗战”，并尖锐指出“就政府当局诸公而言，为功为罪，亦在此一举。”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建立后，消息传到海外，广大侨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菲律宾华侨劳工抵货会给国共两党拍来贺电，并恳请两党同志，贯彻密切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还表示“菲律宾华侨工人，誓与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地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

抗战以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到处宣扬“抗日必败”，散布妥协言论，进行叛国活动。侨领陈嘉庚获悉后，痛心疾首，连续 3 次致电汪精卫，劝其迷途知返。而汪仍执迷不悟，被陈怒斥为秦桧、张昭之辈，并正告汪精卫：“若与言和，各省必定反对”；“分裂等于自杀”。不久，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递交了“敌人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员谈和平即是汉奸国贼”的电报议案，被大会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予以通过，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及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这个议案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并通过，著名记者邹韬奋称赞这 11 字的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38 年 12 月，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后，各地华侨满腔怒火，反汪浪潮波涛滚滚，1000 多封讨伐电报从海外纷

至沓来。南侨总会急电蒋介石，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通缉汪精卫，宣布其罪，捉拿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在缅甸仰光，爱国侨胞还筹款 200 多万元，作为缉拿汪逆的活动基金。就是只有数百侨胞的南非，讨汪活动也开展得热火朝天，颇有声势。受聘在汪精卫创办的《纽约民气日报》工作的爱国华侨，闻悉汪叛国投敌，即反戈一击，坚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一边。1938 年 12 月 31 日，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汪精卫等人“通缉归案，以正国法”。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公布汪精卫等人的叛国罪行，响亮地提出“辩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充分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汉奸卖国贼的无比痛恨和对祖国抗战事业坚决支持的决心。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侨胞十分忧虑痛心。当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率南洋侨胞回国慰劳视察团已达国内的陈嘉庚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表示：“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两党若不幸破裂，发生内战，南洋华侨对抗战必甚形失望。”他殷切希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甚幸，民族甚幸”。陈嘉庚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毅然率慰劳团部分侨领赴延安考察，返回重庆后，作了题为《西北观察》的报告，盛赞边区军民，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和诽谤。

皖南事变发生后，华侨极为悲愤。数百个救亡侨团和爱国侨领纷纷发表通电和告同胞书，强烈抗议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菲律宾 9 个侨团在《告海外青年书》中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

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1] 美国华侨在通电中强调指出“合作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之生命。”

华侨救亡团体和爱国侨胞还以大量事实和亲闻所见，批驳对共产党的侮蔑。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在 1941 年回国了解到国内抗战的实情后,毅然发表演讲说“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抗战办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谈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

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全民抗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动之深入，群众之广泛，爱国之热烈和对祖国贡献之巨大，实为华侨历史所未有。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千百万侨胞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可昭日月。他们毁家纾难，血溅沙场，为民族的独立，创下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其功在千秋，彪炳史册。

（张用建）

华侨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活动

海外赤子，身处异国，但始终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他们的抗日救国的忠勇义举是众所周知的。当时，不少海外华侨放弃优裕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奔向延安。

1938 年是华侨奔赴延安的高潮。其中 5 月到 8 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组织来延的华侨就有 78 人，加上先期抵延的华侨青年，已逾 300 人。1940 年 9 月 5 日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其宗旨是：一、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二、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

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发挥华侨的作用。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向海外千百万华侨发出了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1941 年 5 月 1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公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

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解放日报》特发表题为《欢迎华侨来延兴办实业》的社论,指出在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和正确的政策，是侨胞兴办实业进行企业投资的最好条件。1942 年 5 月，在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海外研究班，由留延华侨 30 余人组成。

先后到达延安的数百名侨胞，以高度的工作热忱和强烈的爱国心辛勤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对敌斗争、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刻苦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奔赴敌后战场。

抗日初期，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 20 多所干部学校，延安成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大熔炉。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积极投入到这一熔炉中。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军政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都有华侨学生,陕北公学为最多,约 200 名。在女子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女学生也有 20 多名,其中有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印度、泰国、缅甸、越南的廖冰、冯志坚、温坚、李树坚、王健华、刘思、康敏、陈洁新、李英岚、余洁、潘懿梅、冰清等人。他们在延安住土窑洞，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攻理论山,自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侨联还组织他们经常下乡，做群众工作。

在工作学习中，经过艰苦磨炼，有的侨胞很快就由“公子∞小姐’转变为八路军战士。不少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毕业后，除一部分留延安工作外，均被派往华北、华中等地抗日前线。马来亚、新加坡爱国华侨社团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吴江、郭凌、曾昭生 3 人，是 1938 年回延安学习的，他们原打算学

成后立即回马来亚工作,但因国民党执行反共封锁政策,无法回马来亚，他们便冲破层层封锁，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有的华侨还为抗日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积极从事宣传、统战工作，使更多的海外侨胞能真实了解延安，同情、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在宣传研究方面，延安华侨救国会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整理了南洋各地的材料,呼请华侨各阶层联合抗战,在南洋开展游击战争。“侨联”还在《解放日报》上开展了《我的一日》征文活动。留延华侨青年通过多种渠道,同所在国保持联系，沟通信息，将自己在延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生动事例传播开去，从而打消了一些侨胞对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大大提高了党在海外侨胞中的威望。华侨救国联合会还经常在报纸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为了援助因太平洋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侨，延安侨联同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及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筹款救济，并于 1942 年 3 月 15 日致电周恩来转达。电文如下：

“重庆周恩来先生转救侨委员会钧鉴：

自太平洋战起，各地侨胞，惨遭流离，我旅延华侨情属桑梓、迩增乡土骨肉之思。顷悉百万侨胞已辗转回国,虽历经艰辛,终庆身归祖国。同仁等获此消息，无限兴奋，谨电庆贺，并致同胞手足之慰问！兹筹得国币 3250 元,特为汇上,以为济急之需。仅此电闻，祈为转达。”

此举，对于团结广大难侨，激励他们回国抗战，作用甚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